

酒店试水长租房,动了谁的蛋糕?

胡海林



酒店巨头开始抢房东的生意,年轻人“用脚投票”。这波操作,直击传统租房痛点,引发“鲑鱼效应”,倒逼行业提升服务质效。

在一个城市扎根生活,租房早已是无数打工人的刚需。长期以来,大家租房的选择路径基本固定,要么找“房东直租”,要么通过房产中介居间服务。现在,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即直接租酒店客房,因为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多家知名酒店巨头扎堆入局长租房赛道。相较于传统租房,酒店长租的

优势是贴合当代租客的需求,精准戳中了大众租房的痛点。过去,租房常常是很多人的“烦心事”:找房要反复筛选、奔波看房,运气不好还可能遇上“二房东”或虚假房源;签约需支付至少半个月房租的中介费,押一付三或付六,预付资金压力不轻;入住后因家具家电、下水管道等维修,可能被房东推诿扯皮,更有甚者被临时撵人;而租期结束退押金环节,遇到挑剔房东被无故克扣,维权又会费时费力。

酒店长租则规避了这些问题,不仅是客户和酒店直签合同,而且价格透明且没有中介费。房间家具家电齐全、被褥卫浴完备,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不用自己购置大件物品,节省了时间和生活成本。酒店自带标准化保洁、维修服务,日常卫生打扫、设施故障维修都有专人负责。而最令人惊喜的,是不少

城市酒店长租房的租金,已经低于同地段的普通住房。

酒店突然杀入长租房赛道抢公寓的生意,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国酒店客房总数约1873.6万间,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阶段。当下国内酒店行业客房存量饱和,旅游、差旅客流不稳定,很多门店淡季旺季差距明显,客房空置率居高不下,单店盈利压力持续增大,单纯依靠短期散客入住的传统模式,已经很难支撑稳定收益。

事实上,由于大量房源掌握在个人手中,我国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程度极低,占比仅约10%左右,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50%左右的水平。以“散户主导”的市场,常常伴生出信息不透明、服务不规范、监管缺位等现实问题,租

客的体验好坏也往往取决于房东的道德素养。

当下,年轻人的居住需求早已不再是“有房住”,而是要求“住得省心、住得舒适”,并且不愿被租房琐事消耗精力。酒店巨头长租模式有着房源标准化管理、常态化维护和规范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零散房东和小型公寓品牌无法比拟的。它的出现,有利于倒逼传统租房行业提升服务,挤压违规操作的生存空间。当然它也并非完美无缺,受场地限制,多数酒店房间没有独立厨房,长期居住不能开火做饭,缺少了生活的烟火气;酒店户型空间普遍偏小,也不适合家庭居住。

可以说,酒店巨头参与长租房赛道的洗牌才刚刚开始,希望这个市场革新带来的“鲑鱼效应”,能让租客享受到更舒适、公平、便捷的居住体验。

“黄胖子”都哪去了

王海宁



“我现在最苦恼的就是招不到一米五几、一米六几的女演员,也招不到一米七几的男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剧院选角的现实难题。他们不仅缺少能扮演《雷雨》里周冲的演员,也缺少扮演《茶馆》里的“黄胖子”。因为,如今艺术院校批量毕业的“高富帅”和“白富美”,并不能匹配舞台上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在帅哥靓妹集中的演艺人才中,“矮、胖”成了稀缺的资源,想找个“丑角”更成了难事,让人们不禁重新审视表演艺术人才的理念和这背后社会文化发展的变迁。

任何人才都有培养周期,都要受“需求”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选拔演员是生产前端,庞大的影视剧市场才是直接对应消费的后端。后端若只下单“高富帅”“白富美”,前端自然会调节艺考选择倾向的指挥棒。

影视剧行业的题材多年来重数据、看流量,一个题材受欢迎开始批量复制生产,古偶流水线、灰姑娘逆袭总题材没完没了,当题材同质化成为常态,角色便先于演员被单一化了。悬浮故事里没有普通人,更没穷人,于是屏幕上只剩豪宅、仙门和写字楼顶层,需要的演员也只剩一种长相、一种身材、一种妆容。

《茶馆》里70多个出场人物,50多个有名有姓的角色,旗人、资本家、太监、地痞、算命先生,三教九流挤在裕泰茶馆里,撑起的是旧时代的社会群像。“黄胖子”这类角色,戏不多,却是这“舞台小社会”不能缺的一角。人艺是传统大院团,有经典大戏托底,才敢

说“生旦净末丑”都得有。可“全员普通人”的长剧近年却鲜见。人均年薪50万元的偶像,怎能有一张平常脸?

选角看流量,“颜值即正义”泛化反过来又影响人物塑造。制作方、明星本人都过于爱惜羽毛,即使人物可以糙,艺人和出品方也不敢轻易牺牲形象,只能“美美哒”。前有“粉底液将军”,后有“还我李洁”,本该飒爽干练的女刑警成了网感妆容甜美的警界小花。不是演员没有潜质,而是单一审美把本来可以开掘的特质优势,硬生生压成了劣势。男帅女美不是错,但是不肯为角色放弃外貌的光鲜,最后只能干扰人物塑造。

选不到特型演员,银幕上没有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一种“窄化”——只有符合“条件”的人和处境有资格被看见。当影视生产通过社交媒体的发酵,承担了“审美符号的再生产”,演员的身体就不再是角色的载体,而成了可消费的视觉商品。舆论场里,男性从“双开门”卷到“薄肌”,女性从“冷白皮”卷到“A4腰”,先倾销一种狭隘的审美观,再引诱你摔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去迎合这套审美框架。当下时尚塑造荧幕形象,荧幕形象又反过来确认这套风气。于是消失的不仅是“黄胖子”,还有现实中本应该有的缺点和遗憾、痛苦和羞耻,而这些恰恰是构成表演背后的深度与真实。

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只有“高富帅”和“白富美”的镜花水月乌托邦从未存在。人艺排练厅的墙上有“戏比天大”4个字,落到选角和创作上,无非是“像角色”比“像偶像”大。一个健康的市场,不该只用一把尺子量人;一个审美意涵丰富的银幕,也不该只让一类人被看见。

因为,舞台需要丰富多彩。

“城兴乡衰”旧脚本 无法定义中国式现代化

王宇明



美国《纽约时报》近期刊发了一篇评论,一方面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又提到了青年失业以及农村地区“被抛弃”是挥之不去的阴霾。问题值得正视,但若把个别场景当作中国农村的全部故事,就好比只盯着车站出口的人流,却没看见有人正拿着车票反向奔赴。

别拿“城兴乡衰”的旧脚本,定义中国式现代化。

广东龙华南村梅子寨,一个仅有29户人家的岭南小村庄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过去,这里老屋闲置,青壮年常年在外谋生,一度是很多人印象里的“空心村”。如今光景大不一样,旧瓦房变成民宿、咖啡厅和手工作坊,年轻的“乡村CEO”忙着接待游客、经营项目。2025年,梅子寨累计接待游客8.8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100万元。

这绝不是村里开了几家咖啡馆那么简单,更值得关注的是,咖啡馆由谁在经营、收益最终流向哪里。在梅子寨,村委会、高校、企业和村民搭伙干事、抱团发展,村集体参与经营,收益通过制度安排稳稳落到乡亲们腰包里。外来人才带来本领和思路,本地村民不是景区的“背景板”,而是家乡变化实实在在的参与者与受益者。

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城市化经验的不同之处。现代化不等于

让所有人挤进少数几座大城市,也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人周末休闲的“后花园”。城市要发展,乡村也要有产业、有收入、有像样的公共服务。进城可以是选择,返乡也应该有机会。通往现代化的路,不该只有开往大城市这一张单程票。

当然,一个梅子寨不能代表中国所有村庄。重点在于,面对现实问题,中国没有把“乡村终将消失”当成宿命,而是继续修路、通网、育人才、兴产业,一点点把返乡兴业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乡村发展,也不能只算经济账。青山绿水、田园风光、邻里温情、传统手艺,这些既是生活,也是资源。把生态守好,让文化留住,再搭上数字快车帮农产品找到买家,这不是现代化走了回头路,而是补齐了过往被忽略的一段短板,让现代化的图景更完整。

这条乡村振兴新路,也引来世界的关注。自2019年起,逾百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村长赴华学习乡村治理。他们要学的不是复制一座梅子寨,而是学怎样把本地人组织起来,让村子有办法自己向前走。

评判现代化的成色,不能只盯着摩天大楼有多高,也要看乡亲们日子有没有奔头。中国城乡发展当然还有不少课题待解,但乡村不是被时代遗忘的角落,更不是现代化列车上被请下去的乘客。

好戏,还在中国的村庄里继续上演。(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哲学学院)



张昕

留住人之前,先读懂「硬撑」

10月17日,“92%的在岗班主任不愿继续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有校长说安排班主任要轮番谈心,有老师推不掉,索性递上医院诊断证明。

讨论大多停在“为什么没人愿意干”上,但92%这个数字背后藏着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那些说了“不愿”却还得继续干的人,站在讲台上是什么状态?

一个不愿意干却被硬“摁”到班主任岗位的老师,不会摆挑子,该开的班会照开,该处理的矛盾照常处理。只是那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比如多找学生谈一次心、多跑一趟家访等,这些会被放下。老师不是不想做,是实在做不动了。这不是某个班主任失职,是一个岗位长期工作过载出现的必然结果。

问题的关键不是“怎么劝人愿意干”,劝出来的同意,老师也就是“硬撑”,能硬撑多久?要改变硬撑状态,得先明确班主任的责任范围,班主任不是“无限责任人”。

“无限责任”是怎么形成的?大量事务边界不清,很多工作最后都默认落进“班主任”这一个筐里。迎检、填表、打卡、活动组织、安全提醒、家校沟通,全都成为“班主任职责”。北师大的调查显示,班主任每周非教学工作时间高达12.3小时。这些时间本来该花在哪儿?该花在学生身上,该花在教学工作中?

改变已经在局部发生,而且路径很具体。上海松江一中建了校内班主任事务白名单,所有需要班主任填的表、参与的检查,由学校统一筛选,非必要事务由行政团队承接,不再往班主任身上堆。重庆万盛试点后,班主任非教学负担减轻40%以上,强制打卡类APP少了5个,跨条线检查从一学期七八波合并为一波。这些做法的共同逻辑不是“给班主任减负”这句口号,而是一个更硬的规则:凡是不直接服务于班级育人的事,不得进入班主任的工作清单。

另一件事同样关键:让班主任在教育学生时清楚背后有依据、有支撑。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印发了中小学教育惩戒实施细则,构建了从当场批评到停课停学的分级惩戒体系,明确教师合法惩戒权限。福建新修订的学校安全管理条例也明确了教师惩戒履职保障机制。这些规则解决的不是“班主任不想管”,而是“敢不敢管”的问题。一个连批评学生都要掂量后果的班主任,即使被迫“摁”到班主任这个岗位,也不会真地去管。

班主任硬撑的状态,也在消耗这个岗位本身的专业积累。一个带完一届就再也不想碰的人,不会把带班经验沉淀下来;一个被“摁”在岗位上的人,也很难真正琢磨怎么把一个班带好。人在岗位上,经验却没有留下来。

92%的人说了不愿,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下学期还得继续站上讲台。热搜会过去。如果“硬撑”这件事没人管,那么明年开学季,同样的谈心、同样的证明还会再来一遍。而教室里那些最需要被多看一眼的学生,依然不到那个有余力的班主任。



多给舌尖上的安全撒“严”

黄 岩

乱象之下,急需重建并巩固信任,让监管跑在风险前,让信任建在机制上,减少“以罚代刑”,把偏松的“橡皮筋”拧成刚性“高压线”。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的意见》,直接点名“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舆论高度关注的事件,直言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明确要求对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从严查处,从重判罚”。意见释放出鲜明的信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容不得半分含糊,必须下猛药、出重拳。

食品安全最能牵动人们神经,哪怕一起个案都易引发公众的焦虑情绪。“甲醛白菜”,靠蘸根保鲜的灰色套路屡打不绝;“敌敌畏消杀”,用高毒农药为上百家餐厅提供虫害防治服务,客户里不乏消费者熟知的连锁品牌;“药水杨梅”,违规浸泡防腐剂、添加三无甜味剂,几乎是半公开的操作。这些乱象刺痛公众,也

抛出一个绕不开的追问,这些年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相关法条不可谓不严,为什么总有人铤而走险、知法犯法?

答案藏在违法成本的账本里。很多问题查到最后往往以罚款收场,“以罚代刑”无形中成了不少违法者的“逃生通道”。在违法者的算盘里,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既然“被抓概率低、出事代价小”,那么逐利的诱惑就压过了对法律的敬畏。

绝不能再任由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下去!只有依法从重惩处,才能打破行业潜规则,为从业者划出不敢逾越的后果红线。而要真正把“从严”落到实处,核心要在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的“衔接”二字上啃硬骨头,诸如案件移送标准模糊、检验鉴定规则不清、证据转化难以落地等梗阻必须逐一打通。

全面发力!一方面拧紧司法“阀门”,对刑事诉讼全流程各环节从严要求,明确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坚决依法从重判罚;另一方

面打通“堵点”,推动加强部门间沟通衔接,明确案件移送、检验鉴定、证据转化规则,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健全反向衔接机制,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无缝对接。说到底,就是要把偏松偏软的“橡皮筋”拧成刚性“高压线”,让违法者彻底认清,踩了食品安全红线,再别想交罚款就能摆平,刑事追责逃不掉,个人责任跑不了。

食品安全治理永远在路上。从顶层制度的靶向部署,到执法司法的全链条打通,再到法律制度的系统完善,“严”的信号正层层传导、落地落实。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处罚到人”从监管要求上升为法律条文,正是要把“严”的基调长久固定下来,让震慑效应持续发力。

严惩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感,事关最朴素的民生福祉。这件事,理应从严,必须从严,也将一严到底。

做有锐度的思考者



扫码关注
“辽望观天下”



请扫码投稿



长语音不香了?

事件源起:微信视频号“辽望观天下”发布《“有事好好打字”突然火了!长语音,你烦么》,火遍全网,网友观点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呆泥 微信语音直接转文字不好吗?为啥硬要发语音。

夏天的风 长语音最怕的不是长,怕的是不分场合发,而且是连着好几条60秒。

小奇猫 想想当年为什么会用微信语音呢?用惯了开始矫情了。

云云 没人觉得打字对于要表达的内容,会造成语义流失吗?